

中国经济进入减速提质新阶段

张茉楠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运行在7%~7.5%的增长区间,这种增长尽管远比2000~2008年平均10.2%的增长降低一个台阶,但也正在经历一个“提质增效,挤出水分”的新阶段。

高增长之后需要“换挡”

最新公布的中国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22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拖累继续放缓,发电量也出现年内首次同比下跌,但这些数据的下滑并不代表中国经济“衰退”,“硬着陆”,甚至是“崩溃”。

到底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至国际舆论上,总共出现过3次比较集中的“中国崩溃论”,分别是1989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然而,中国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1978~2013年间,中国GDP增长了155倍。事实也将证明,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度担忧恐怕也没有太大必要。

的确,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18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下滑周期。但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

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并且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都说明,一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需要有一个调整期。增长速度会回落一些,但这种回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

过去中国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主要来自“高投资”和“强出口”。从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旧增长动力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动力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出现波动,这并不奇怪。在这种新常态之下,中国一方面需要接受经济数据的波动,一方面需要尽快完成结构的优化升级。那种经济下行压力一增大,就指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熨平”周期的论点和做法是一种短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无裨益。

世界需要以新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变化

世界需要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增长动力“真空”、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升级困难、技术创新缓慢、社会矛盾激化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替代动力,而不是短期依赖于政策刺激。

事实上,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中国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中国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再依赖过去的外延式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去杠杆”,“挤水分”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首先是挤投资水分。去产能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的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其次是挤消费水分。2013年以来,反腐浪潮大大压制了政府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再有就是挤出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主管当局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中国经济增长也回归理性和常态。

将从“规模红利”转向“效率红利”

增长速度放缓的背后,人们很少

关注到结构失衡的纠正。一是官方数据已经反映而学者也大都接受的变化,如经常项目盈余缩小;二是官方数据有反映但一些学者不接受的变化,如收入分配的改善;三是官方数据没有反映但部分学者根据分析猜测的变化。比如,在生产领域,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明显好于传统制造业;在消费领域,网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增势明显。2013年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9万亿元,2017年有望超过20万亿规模;在投资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势头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投资增速。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三产占GDP的比重是46.6%,增速持续快于工业,占GDP比重继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许多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些新的结构性变化都在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也许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中国转型也必须经历的代价,以及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为“常规”,而增长的动力也将从“规模红利”转向为制度和生产力的“效率红利”,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体育终究要回归民生属性

马涤明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部署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从亚运、奥运等国际赛事来看,没人会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强国。但随着我国在竞技体育事业上的越来越强,体育强国应走向体育大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或者说,只有全民体育健身事业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才称得上是体育强国。国务院的《意见》,核心思想是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首先是顺应民意之举;其次,将体育健身事业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产品来做,理念上的进步是更大的亮点。

体育运动的重大意义和终极目的,究竟是以奖牌为本,还是以人为本,通过体育活动中使人增进健康,获得身心愉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在理论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奥林匹克主义价值理念也作了最好的回答: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奖牌体育”一统全局甚至压倒一切,思维一直僵挺。上届全运会上,一位地方体育官员曾公开表示,“我

们全民健身搞得全国第一,但全运会或奥运会拿不到一枚金牌,就是失败,就得下课。在我们体育人的眼里,金牌是要大于健身的,这是我们考核系统决定的。”在“金牌大于健身”的公开原则下,国家不惜重金培养专业选手,而对公众体育事业则普遍吝于投入。近年来,群众健身与设施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比如院校体育运动场所被市民“鸠占鹊巢”,广场舞或广播体操扰民,甚至马路都成了羽毛球场;而公共体育场馆则寥寥无几,价格上更是“贵族消费”。背后的问题是,公众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未实现同步,政府对国民体育民生的欠账甚多。或者说,体育的民生属性淹没于“奖牌思维”中。

笔者认为,“奖牌体育”于我国来说,确有其重要性,应该受到重视,但在“奖牌体育”达到较高水平,或说已经实现体育强国的梦想之后,到了该向体育大国转型的时候了。并且,“奖牌体育”与全民体育、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之间并不矛盾。国务院要求,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体育公共服务基本覆盖全民。在政策上,这应该是体育向民生回归的一个标志,令人欣慰。同时,全民体育健身事业推动的体育产业发展,能够拉动经济。并且体育产业永远属于朝阳产业,可持续性发展上不存在问题。

科研体制不改革世界级科研成果难出现

张燕

中国2013年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为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与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明显,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科学家鲜有出现。

科技投入增加迅速,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不多,特别是世界级科研成果匮乏,其实是个老问题。而且,不仅仅是科技领域,人文社科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客观而言,科技成果,包括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和国际接轨,本身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是时间和教育问题。凡事都有个过程,特别是科研,有时候需要时间和基础的积

累。而中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和科研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只有30多年,要求中国立马出世界级成果和大师本身就不现实。这么讲并非为中国科研界辩解,只是陈述一个因素: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科技投入,特别是财政科技投入如此之大,出不了好的科技成果确实是个问题。其实各国都会通过财政投入到科技研究领域,但投入的效率和方式有所不同,这就是科技体制的差异。而科技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科研水平的提升。

欧美发达国家就不说了,近邻日本、韩国,从科学水平基础上说,若干年前和我们差不多。但这些年,他们的进步有目共睹。譬如日韩在电子信息产业等技术领域的进步,特别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上的成功,实在是令我们汗颜。事实上,他们信息产业也

是在政府的扶持,包括大量的财政投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不同的是,基础研究方面,他们的财政科研投入配置方式不是由官员来决定,而是更多靠同行评议;同时产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更是引入了市场手段,将创新的主体交给企业。

所谓学术的交给学术,市场的交给市场。相较而言,我们的科技投入,很大程度上由各级官方机构来主导,行政化、官僚化严重影响了科技资源的分配。譬如最近被取消院士头衔的李宁,作为“学术带头人”,其更像一个科技界的官员,垄断和决定太多的学术资源,最终中饱私囊,但评上院士后却不再有像样的科研成果。正如九三学社中央今年的政协提案所谈到,以行政为主导的科技资源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与失位并存。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过“无形之手”去指定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

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尤显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很重要。

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村修二取得蓝色发光二极管(LED)研究成果的时候,只是在四国岛上的德岛市内一家小公司工作。这也提示我们,有必要改进现有的科技体制,即便是财政投入的科技研究资金,也应该通过市场手段,让小微科技企业 and 新型研发机构分一杯羹。

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不仅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还要通过合理的晋升和利益分配机制,激活他们的创造力,让财政科技投入效率更高。

欧洲的困境与新兴市场的“危中之机”

罗宁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稳健,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达到17.1%的欧元区,自去年下半年迎来久违的增速反弹之后,似乎又将面临困境,股市债市大幅走低,甚至已经企稳的主权债务也再次显露出危险迹象。

欧元区经济复苏渐缓前景不乐观

2014年初至今,欧洲经济复苏势头逐步放缓,前两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0.9%和0.5%,根据彭博资讯对各研究机构预测数据的统计,第三季度增速预估加权平均值为0.75%,全年增速低于此前各家机构给出的1%乐观预期值已是必然。

总体上看,欧元区经济结构性问题未有明显改善是继去年下半年反弹之后增速放缓的根源。虽然欧洲央行推出的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流动性注入方案在降低重债国主权债收益率、稳定市场信心产生了较明显效果,但欧元区仍未在产业“空心化”、劳动力市场僵化等方面寻找到治病良方。目前欧元区总体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1%以上高水平区间,青年失业率高达23.3%。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焦点评论

初中课本现大量广告



初中课本有广告,如此植入太糟糕。教育追求真善美,岂容铜臭熏大脑。法规虽好被虚置,权力寻租耍花招。正本清源除污染,问责切莫变口号。

王铎/图
孙勇/绘

增速放缓、复苏风险抬升做出反应,主要股指大幅下跌,债市价格走低,部分成员国主权债收益率快速攀升。9月30日至10月16日,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下跌了9.3%至2781.33点。其中,德国、法国股市市值分别蒸发1091.1亿美元和1869.7亿美元,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股市市值跌幅分别达到16.6%、12.6%、9.1%、13.4%。

欧元区国债市场的表现也引发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此前随着危机逐步企稳而走低的重债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再次反弹。截至10月16日,希腊、葡萄牙、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月末分别上升232.9、31.2和24.6个基点至8.96%、3.48%和2.58%,德国同期国债收益率则下降12.7个基点至0.82%。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主权借款成本飙升再次拉响了欧债危机的警报。一方面,关于希腊可能提前退出“三驾马车”救援计划的传言在市场上蔓延,如果希腊为了获取更自主的政策制定权而在危机尚未真正解决的情况下退出救援,未来可能再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另一方面,希腊政局不稳定因素加大,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紧缩政策的左翼联盟Syriza目前的支持率远远领先其他政党,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或将加大。

新兴市场再临“危中之机”

欧元区经济复苏放缓对于新兴市场或将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首先,欧洲市场对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据Wind资讯统计,今年1至8月欧元区从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进口商品占四国出口金额比例分别达到34.5%、17.2%、14.9%、10.8%,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5.1、4.3、1.6和1.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持续疲软,欧元区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新兴市场出口贸易或将面临更大冲击,从而加大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

其次,欧洲金融市场异动也给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压力。截至10月16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收于970.7点,较9月末下跌了3.5%,其中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股市市值分别减少了351.5、435.9、81.1和77亿美元。随着市场紧张情绪的升温,避险偏好明显抬升,将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走势的压力。全球市场恐慌情绪的代表性指标VIX(标准普尔500波动率指数)10月15日冲高至26.3点,较一个月前翻了一倍多。

当然,欧洲市场风险上扬的,也给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危中之机”。几年前,在欧债危机恶化升级之际,许多迫切想在欧洲市场扩张的新兴市场投资者因潜在的巨大风险而出现摇摆,但也有部分投资者在危机中审慎研判、果敢出手,抓住“危中之机”成功实现了关键布局。目前欧元区虽然再次面临困境,但就市场风险方面与危机阶段相比已大幅下降。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提速更为其进入欧洲市场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投资者应结合我国支持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对于欧投资的相关政策,在合理甄别投资对象、把握国别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在欧发展的重大突破。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工研城市金融研究所)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 0755-83501640;发电邮至 pp118@126.com。